

沒有宗教改革，就沒有梵二會議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筆者年青時曾經參加天主教會，那時候我最敬重的牧者之一是【公教報】前總編輯夏其龍神父，夏神父十分平易近人，當時百忙的他仍然願意花時間對我這個目不識丁的晚輩循循善誘。很多年之後我有機會閱讀夏神父在今年四月出版的近作【認識天主教】，閱後我對他更加敬重。

在這本書中他提及一些敏感的話題，例如宗教改革，他指出：由十四至十六世紀，「每次有人要求教會改革，教會便將他殺死，第一個英國人克里夫死了以後，主教開會決定，要將他的骸骨由墳墓挖出來燒了，表示不可以讓他在世上存在；第二個捷克的改革提倡者胡司，在隔了一個世紀後就在……康斯坦茨城的會議上亦被判處火刑；然後再隔一個世紀，便輪到馬丁路德再提出改革，時為十六世紀。情況已經不只是教會的問題，而是涉及權力的爭奪，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夏神父並沒有掩藏這段令天主教會尷尬的歷史，一方面這段教會歷史的確令人難過，但另一方面當中也有令人鼓舞的地方，經過了三個世紀要求改革的呼聲，最後宗教改革才得以開花結果。那時候也許不少人已經感到灰心絕望，在政教合一底下，天主教會可以動用武力去鎮壓任何反對的聲音，人們會感到任何抗議無非是以卵擊石，那麼何不尋求建立一個和諧和穩定的教會，而不是撕裂族群？也許有人會說，若果否定了教皇的絕對權柄，天主教會的影力就會被削弱，歐洲就會動蕩不安。

筆者同意在宗教改革之後，歐洲的確經歷了分裂和動蕩的年代，例如好似是永無休止的宗教戰爭，其中最慘烈的一次是發生在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期間的三十年戰爭，日耳曼的人口因三十年戰爭而少了三分之一。古典研究專家邁克爾·黎牙實比（Michael Legaspi）指出，新教改革之後，沒有單一的神學和文化權威能夠凝聚歐洲，聖經作為絕對教義的基礎已經壽終正寢，但另一方面，學者開始以學術方法去研究聖經，日耳曼的大學成為了歐洲的學術重鎮。其他學者則指出，由於思想的解放，過去幾百年歐洲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各個範疇都突飛猛進。新教改革鼓勵了挑戰權威的精神，因而逐漸瓦解了中世紀封建制度和削減了封建領主的力量，宗教改革更間接開導了現代的民主理念。

夏神父又記述了教皇國衰落的歷史，從前教皇國的領土遠遠超過現在的梵蒂岡，它包括了今天的羅馬。一八七零年普魯士向法國宣戰，拿破崙三世調走守衛羅馬城的軍隊去迎戰普魯士，結果意大利王國的軍隊乘機佔領羅馬。夏神父用十分生動的手法去形容當時教皇的反應：「教宗失去了王國，十分傷心，把自己困在梵蒂岡裡不出來，好像孩子被媽媽

打，躲在床下，用雞毛掃也掃不出來。其實，教宗不知道自己執到寶，在八世紀得到的教皇領土現在比意大利人拿走了，其實應該要感謝他們，因為教會可以真正回復成一個沒有領土的宗教團體。可是，教宗既有的領土沒有了，突然覺得很空虛，一大段時間不習慣，情況就好像我一向戴眼鏡，突然可以不戴眼鏡，雖然看得很清楚，不過鼻樑上有點空虛，不習慣。」

這段描寫真是令人拍案叫絕！既得利益者以為失去了特權就是世界末日，那時候他們並不明白「退一步就是海闊天空」、「危機也是契機」等道理。其實，天主教並沒有因為失去土地而衰微，相反，她能夠在政教分離下邁向現代化。

促進天主教會現代化的是一九六二至六五年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導的梵蒂岡第二次公教大會，梵二會議是天主教會自己內部的宗教改革，藉著梵二會議，天主教會打破了許多千年不變的傳統，例如梵二之後彌利用本地語言，而不是用拉丁文。夏神父說：「若望二十三世開了一扇窗，讓新鮮空氣慢慢吹進來。」瑪利諾修會會士傑姆·克羅格（James Kroeger）認為梵二強調教會的「可改革性」，梵二開啟了天主教會「革新、復甦、轉化、皈依、改變、成長的旅程」。

這是一次遲來的改革，但遲到好過冇到。絕權力使人絕對腐敗，我不相信擁有絕對權力的人可以在毫無監督下自我反省，我敢說，若沒有宗教改革，若教皇沒有失去羅馬，就大有可能沒有梵二會議！

克里夫被處死和宗教改革相距約一百五十年，而宗教改革和梵二會議則隔了約四百五十年，兩者加起來總共有六百年。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人們要求什麼事都要立竿見影，但神是歷史的主，有耐心的人方能以一葉扁舟，衝過歷史長河的驚濤駭浪。

2016.5.27